

## 我的职业革命生涯

○马识途（1945中文）口述 黄文辉整理

马识途，原名马千木，1915年出生于四川省忠县，1936年7月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在校期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领导的南京学联小组。这一时期，他在地下活动中为了避免自己被暴露，曾使用“马千禾”的名字。

1937年冬入鄂豫皖边区党训班学习。

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志愿书上，他将原名“马千木”改为“马识途”，用以表示自己“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后任武汉汉口职工区委委员，同时和胡绳共同主办《大众报》，又任鄂北特委委员、枣阳县委委员，1939年调任鄂西特委书记。

1940年，鄂西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1941年皖南事变后到重庆中共南方局，不久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1945年毕业后调任滇南工委书记。1946年调成都任川康特委副书记。

1966年，马识途在“四清”运动中收到西南局办公厅的通知，让他回成都开会。就在这会上，他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写反党反社会主义文学作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文革”中四川第一个被揪出来的人。1979年，在隔离审查和入狱6年后，马识途被正式平反。

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中

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科委副主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文联主席、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副会长，四川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国际笔会中心理事。

2013年1月，获首届“东方文豪终身成就奖”。

从1935年起，马识途开始在一些报刊上发表短文，第一篇文章发表在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地方印象记”征文中，标题叫《万县》，获得六块大洋奖金。1949年以后主要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1959年，在《四川文艺》发表了短篇小说《老三姐》，此后，陆续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等发表短篇小说《找红军》《接关系》《小交通员》和《回来了》等等。著有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夜谭十记》《巴蜀女杰》《京华夜谭》《雷神传奇》等，长篇纪实文学《沧桑十年》《在地下》，中篇小说《三战华园》《丹心》，短篇小说集《找红军》《马识途讽刺小说集》，散文集《西游散记》《景行集》，杂文集《盛世微言》，另有《马识途文集》（12卷）。

另外，马识途在书法方面也有很深的功底，曾出版有《马识途书法集》。2014年5月，马识途百岁书法展在中国现代文

学馆举行。

## 西南联大革命生涯

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我所在的鄂西特委遭到国民党的破坏，我的爱人和我的女儿被捕了，原来的省委书记和省工委书记也被捕了。在做了一些组织上的安排之后，我就到重庆我们党中央的南方局，就是周恩来同志当书记的那个南方局去汇报了工作，并且研究了如何处理相关问题。

当时国民党特务在湖北、四川等地到处追捕我。到南方局以后，我说明我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请求组织让我到延安去学习一段时间。当时南方局的领导同志跟我说：你是四川人，对地方的事情比较熟悉，长期担任革命领导工作，在对付敌人等许多方面都有经验，白区的工作仍然需要你这样的意志比较坚定的好的同志在这里坚持。你想到延安当然是大家都能理解的，但工作上需要你，你还不必到延安去。南



2014年6月14日，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在清华大学近春园招待所为马识途学长祝贺百岁寿辰，邱勇副校长代表学校向马识途学长赠送一尊琉璃小马，寓意马老健康，茁壮如小马

方局的同志征求我的意见，让我看到什么地方去比较合适。我说看起来云南的政治情况可能比较好一点。当时的云南是军阀龙云当权，他与蒋介石一直存在矛盾，使得蒋介石的势力在那里并不是很强，特务的活动也比较弱一些，这些情况使得我到云南隐蔽下来比较可靠。当时，党中央所提出的白区地下党的方针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就是要求我们的党组织能够长期地埋伏下来，慢慢地积蓄力量，等待民主革命高潮的兴起。这是当时总的战略性的方针。

到云南去做什么呢？组织上让我去考西南联大。因为我原来在南京中央大学上过学，只是在参加革命后没能继续读下去，现在去考西南联大当然是有把握的，因为我上过大学嘛。

到昆明去以后，我就考上了西南联大。本来我可以通过转学，从中央大学转到西南联大，但党组织要求我从一年级读起，这样使我就有四年的功夫到那里埋伏，进行地下工作。所以，如果有人提出来我当时是否有革命任务，我的回答是有的：任务就是让我去埋伏。所谓埋伏，就是不再进行党的革命活动。当时周恩来给我们提出来的方针叫“三勤方针”，就是勤学、勤业、勤交友。我当时在上学，当然要勤学了，并不要求我们在那里马上就开展活动，而是要好好地把自己的功课学好，好好地交一些朋友。当时特别提出，如果我们想真正能够工作，事先必须交大量的朋友，而要能真正交朋友，必

## □ 口述历史

须要把自己的功课学好，要让大家一看，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勤学与勤业的人，只有这样你才可能站得住脚。

1941年的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向香港发动闪电式的进攻。当时，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不少民国要人和文化名人，如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陈寅恪、陈济棠等都寄居于此。为了避免这些人成为日军俘虏，重庆国民政府应各方要求，加派航班，力争在日军占领之前将这些要人抢运到内地来。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控制了飞机，主要供一些官僚使用，像陈寅恪这样的教授就坐不上飞机。以至于当时在香港《大公报》登载了一则消息，说的是孔祥熙这样一位国民党当局的高官家属，居然把洋狗都带上了飞机，都不让我们的这些知识分子坐飞机撤退出来。这个消息在《大公报》登载出来以后，传到了昆明，一下子在联大同学里就沸腾起来了，因此就展开了一个“倒孔运动”。这个“倒孔运动”本来不是我们共产党或者进步分子发起的，因为当时我们还是觉得不能随便擅自行动嘛。当时是因为国民党的“三青团”与孔祥熙之间有矛盾，实际上这个矛盾我们早就知道，因此“三青团”就提出了“打倒孔祥熙”的口号，发动同学们起来游行示威。

本来我们的方针是长期埋伏，别人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但当时我觉得有必要引导学生运动向比较好的方向发展，所以我也参加了他们所领导的那个运动。当时一年级的同学普遍只有18岁，而我已经27岁了，人家一看只觉得是一个老学生来上学了，当然看不出我真正是什么身份。



马识途学长健步走入祝寿会会场，受到西南联大潘际銮会长（右1）、李晓常务副会长（左3）、李忠副会长（左1）、张文朴副会长（左2）等校友们的热烈欢迎

但是一开会，在谈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我的意见和主张一提出来，大伙马上就觉得是对的，于是我就组织游行。一年级同学到了校本部将二、三年级发动起来了，这样我就带着队伍上街了。上街走到云南大学的门口，云南大学的学生也出来了，中法大学的学生也出来了，以至于有一些中学生也被动员起来了。

总结起来，当时发生的这么一件事情，并不是我们党预先系统地研究后组织领导的，而是三青团搞的一个东西，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避免群众运动出现混乱，出现乱打乱闹的现象，造成很不好的结果，我也参与了这个学生运动，我是本着这样的目的去参与这一运动的，但这也让我出了头，而以我当时的身份，出头是很不好的。

运动过程中，联大当时的领导，包括梅校长，都亲自尾随着我们的队伍，龙云也派出了警察守卫在街道两侧，名义上是监视，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看得出来是在保护我们。他们害怕国民党的特务借此机会破坏游行，或者出现暴徒的做法，如果这

样，对学生就很不好了。所以整个游行没有出什么问题，是很正常地进行了一次很正规的游行示威活动，然后大家又回到了学校。

出现这一事情的时期，正值整个国家政治上处于低潮的时候，国民党在到处逮捕共产党，打击进步势力，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都处于一种沉寂的状态，唯独在昆明，居然学生被发动起来了，进行了一次大的运动，有几千人上街游行，这使得蒋介石很紧张，他们就想来镇压，就派了特务头子康泽带了一帮特务来到昆明试图破坏学生运动。但我们做得很平和，没有什么不正当之处，完全属于正规的请愿，这帮特务自然也无从下手，只是提出这场运动一定有共产党或者进步分子在里面起作用。当时他们不好动手，龙云也不准他们动手。但是到了那个学期放暑假的时候，康泽就在昆明专门办了一个夏令营，组织三青团进行学习，想借此机会逮捕学生。我们同

学中在国民党内部有认识的人，传出来话说这帮特务并不准备多抓人，只是一个年级抓一个，一年级就抓我，还有云大的侯成。我们两人得到消息后就赶紧撤退了。实际上我还是犯了一个错误，因为南方局给我的任务是埋伏，不参加任何这方面的政治活动，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却参加了，结果使我不能继续在西南联大待下去了，而且还要被逮捕，而我还是有旧案的，国民党到处在抓我，虽然我已经改了名字（改名为马千禾），他们也不知道我就是恩施的党的负责人，只知道我当时是一位学生，但对我来说，我没能完全执行好南方局给我的指示。

庆幸的是，在康泽准备抓人时，龙云不准他抓，所以他没敢动手，这样，开学后我又能够回到学校继续活动下去。谈到“倒孔运动”，我要说的是我没能很好地执行南方局的指示，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后来在整风运动时我作了自我批评。我认

识到，当时为什么要出头，是因为自己缺乏理性的思考，仅凭着一时感情的冲动，因为我的爱人被捕了，我的小孩也失踪了。我知道他们反正是出不来了的，肯定要牺牲了，复仇的情绪一直被压抑着，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产生了一种想要报复的情绪，结果却给继续埋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庆幸的是云南当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



出席活动领导和校友们合影

## □ 口述历史

政治环境，没有像在其他省里头国民党政府实行白色恐怖，疯狂抓捕进步分子和共产党人，所以，使我得以能够在昆明继续待下去，一直待了四年嘛，后来慢慢在那里做工作，积蓄力量，组织一些进步活动，最后发展为“一二·一”学生运动。

在整个工作过程中，我一直是担任我们党的支部书记。那个时候党的支部书记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党委书记吧，是地下的。我们在那里大概进行了一二年的活动。“倒孔运动”也附带一个好处，客观上一方面使我认识了一批好的人，因为一些政治倾向好的同学都参加了，使我认识到了哪些同学是比较好的进步分子，也认清了国民党“三青团”这样带特务性质的组织有哪些人，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我对某些国民党特务分子的警觉，因为我知道了他们中谁是“三青团”成员嘛，所以使我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客观结果。我就是这样一个基础上，认识了大概有十几个进步的同学，并和这一批同学变成了很好的朋友，由进步分子组成的一帮朋友。

在这些朋友中，有一些是从外地来的，有些原来就是地下党但和组织失去了关系的，这样我实际上积累了一些思想比较好、思想进步的朋友。这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有一些人是其他地方的地下党员，在被国民党抓捕时没被抓着而流落到昆明隐蔽的，在这次运动中他们又露出来了，我也看到了一些。另外有一些同学在别的学校就是进步分子，思想就比较进步，在这里参加活动时也表露出来了，这样我就有意识地从中选择一些比较好的与他们交朋友。当然，这种交朋友并不是马上谈什么进步之类的，就是单纯地交朋友，就是上茶馆呀、

游乐呀，出去旅游呀，等等，一起进行这样一些群众性的活动，慢慢发展到交心谈心，由此就知道了大家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等情况。到1943年的时候，我的周围就团结了一批进步的学生。因为他们的年纪都比我小八九岁，我就相当于是老大哥了，大家都叫我“老大哥”嘛。

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就提出了要求参加从事革命活动的组织。当时党中央的南方局已经把所有的地下党组织埋伏下来了，组织打散了，不准有任何组织，也就是完全变成了一个一个个的埋伏下来的共产党员。有的党员被要求去找一个什么职业，或者去上学，若干年后上级组织再来找这些党员，约定了联系暗号后各人就分散开来了，当时就是采取这种方式来保存革命力量的。而我这里就有些不同，通过“倒孔运动”，发现一批先进分子后我就有意识地做他们的工作，就有一批人团结在了我的周围，他们就提出来应该建立自己的组织。当时在联大实际上已经有了许多组织了，包括各种学会、壁报社、诗社、文学社、剧艺社等。在这些团体中也有一些带有进步性质的团体，我就有意识地把我身边的好的同学动员去参加那些进步的团体，成为这类团体中的核心人物，这样在我的周围就有了一批可靠的进步分子的骨干。当时有人就提出来要建立组织，但当时中央是不让建立党组织的，但我那里又确实需要一个支部，所以我就提出来要建立党支部。经过云南省工委向南方局请示，特别同意在联大搞一个支部，尽管这违背了中央精神。一开始这个支部只有三个人。群众中有一些比较好的要求参加这样一个党的组织，但我不敢发展，只有一个我发展了，

这个人现在在北京，就是我的好朋友李曦沐（李晓，曾任国家建委副秘书长、国家测绘局局长），他当时就要求入党，我就接收了，但我向上面汇报时上级批评了我，说中央现在不准发展党员你为什么发展党员啊？这可是违反组织工作精神的，我说我已经发展了，怎么办啊？我已经答应发展他成为党员了啊！最后云南省委把李曦沐叫做党外“布尔什维克”，给他叫了这么一个名称。就是说像对待正规党员那样对待他，但组织上暂不承认他是党员。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我们的工作做得是好的，但在组织发展上则跟不上，后来看来是一个弱点。

这样的工作我一直做下去了，经历了1943、1944、1945年。1944年的时候，全国的学生运动的高潮到来了，首先从云南的西南联大开始，西南联大是带头的，进步学生运动次数很多，许多教授也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也在昆明建立起来了。我们共产党组织在当时还是保守的，党员也不多，仅有我们三个，其他先进分子只被称为党外“布尔什维克”。但到1944年的时候，我们忽然发现群众自己组织起来了，出现了自发组织革命活动的党组织的情况，实际上是党的外围组织，也就是青年团性质的组织。而我们却还没有大力发展自己的组织。当时有几个出色的人自发地组织了共产党组织，但我们并不了解这些组织者都是一些什么人，我们当时还怀疑这样的组织是不是属于“钓鱼”的，是不是故意成立一些假共产党组织来组织一些进步活动，然后把一些进步分子网罗进去。我们当时很怀疑，就向中共云南省工委请示求证，他们说他们也不知道这些人都是

些什么人。后来我们就派人去做一些调查，有意识地参加他们组织的一些活动，才知道他们并不是“钓鱼”的，而是与原来的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的真正的共产党员。比如其中有一个叫洪德铭的同志，他是从新四军过来的，他因为是失掉了关系的，当然不知道我们党当时的政策。他自己就在那里搞起来了，就建立了一个民主青年同盟，一下子就积累了几十个进步青年参加了他的组织，而我们还没有发展自己的组织，因为我们没有接到上级的指示。因此我们就向云南省委作了汇报，强调我们已经落后了，我们还在执行中央的“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的方针，可现在群众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经我们请示汇报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同意发展党的组织，同意建立民主青年同盟。那些成立在我们前面的民主青年同盟叫第一支部，而我们共产党所组织的民主青年同盟叫第二支部。这样就变成了两个组织，就是第一支部和第二支部。由于我所联系的人比较多，第二支部的力量就比较大一些。后来第一支部经过了党组织的确认，上级又专门把原来疏散的党员袁永熙调回来，叫他参加了民主青年同盟的第一支部，在那里建立党组织，他在那里发现进步同学后就发展为党员。还有王汉斌，他是在缅甸参加的共产党，后来调到西南联大。他就参加过民主青年同盟第一支部的活动。当时上级党组织提出来，准备把两个支部变成平行支部，以应对可能遭受的破坏。当一个支部被破坏后，还有一个支部仍然存在。在学生运动的组织方面，仅在最高层之间有联系，他们那边支部的负责人是袁永熙，我这边我是负责人，我

## □ 口述历史

们之间有一些往来、接触和联系，最上面当然由省委来领导，最后发动起了一个比较大的民主运动，也就是“一二·一”运动。

“一二·一”学生运动发动起来后在全国就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包括重庆、成都等许多城市的学生运动都被发动起来了，掀起了全国性的学生民主运动的高潮。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共产党组织与中国民主同盟联合起来，在全国掀起了一个比较大的民主运动，使整个革命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所谓的“第二条战线”，解放区军民的武装斗争为第一条战线，蒋管区由青年学生和进步分子组织起来的民主运动也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力量，给国民党反动政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我们党把这种民主运动称作“第二条战线”。这时我们党的组织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1945年我从昆明的西南联大毕业之后，上级派我到滇南，就是云南南部地区去当滇南工委书记，准备在云南南部各个县里去发展党的组织，准备进行游击战争，我在那里搞了一年，已经搞成了一定的规模，我们占领了滇南的十几所学校，都是靠了我们的进步分子。然后从学校教职员工以及学生中继续发展进步分子，他们回家后又从家里的农民中发展了不少进步分子，这样使我们的进步力量渗透到了滇南的农村之中，这为我们展开农村的武装斗争提供了条件，后来云南南部成立了“滇纵”，就是“滇南纵队”，一直坚持到全国的解放。我本来想留下来的，但在那里工作了一年、打开了局面之后，南方局又调我回四川。当时我确实很不情愿，因为觉得在那里工作得很有一点希望了，但组织却又要将我调到四川的成都，担任川康

特委的副书记。我知道四川那个地方特务特别多，反动势力特别强大，要在这样的地区打开局面是不容易的，对我来讲也更加危险一些。我当时提出希望自己能留在云南，但上级领导不同意，说无论如何都要调走，还跟我说飞机票都买好了，身份证件也都制作好了。

### 西南联大学习生活

北大、清华和南开这三所学校的民主传统是非常深厚的，由他们组成的联大其最大的特点就是陈寅恪所说的：自由之思想。这是一个整体性的风气，从学校的教授到普通同学，都崇尚学术，学术空气非常浓厚，允许自由地讨论，组织了各种学术活动。学生素质也有一定的高度，因为当时能够考进西南联大的都属于十分优秀的青年，可以说是把蒋管区中的好的学生有极大一部分都集中到了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可谓是集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关于西南联大的教育，许多校友都有很好的回忆文章，《清华校友通讯》也刊登了很多东西，我讲不出其他更多的内容，但有几个基本点可以讲一下。

首先，就基础教学而言，我们读一年级的時候，所有的基础课程必须由第一流的教授来讲授，这一点可以说是很特殊的。这些教授不仅仅是在教基础课程的时候，能运用其丰富的教学经验，使用比较好的教学方法使学生能够很好地理解，还往往拿出一些新东西来向我们讲授。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新同学中一开始就倡导良好的风气，因为有名的教授本身具有良好的学风。教授们常常对我们说：“我们只能是把你们带入门，至于如何往前走则要靠你们自

己了。”他们强调给我们打基础，用四年打基础，然后靠学生自己往前发展。当时他们秉持的就是这样一种教育思想。所以，西南联大的学生从第一年起就与众不同，通过基础课的严格训练，打下了良好的专业基础。

当时对课程的要求十分严格，要求如果有三门课程需要补考就要作退学处理，实际上我们那一年，只要有一门不及格就得退学，而且不允许再考，就是下一届不能再报考西南联大，这样一种很严格的要求，使得同学们的学习都是兢兢业业的。

当时的生活条件可是非常差的了，吃的是很不好的霉米，而且里面有很多沙子，都是吃贷金，没钱嘛，吃得很坏，住得也很坏。至于学习的环境，那教室都是茅草房子，没有桌子，桌子就是那种凳子上面放一块木板。到图书馆要抢座，几乎每一天到图书馆都要抢座位，排队去抢座位，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大家发现到茶馆也一样可以学习。联大附近那几条街，文林街，凤翥街，龙翔街，整个都是茶馆。这些茶馆，几乎变成了联大的第二图书馆，大家可以在那里很自由地阅读，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在那里待一天，中午离开时可以把茶碗反扣起来，午饭后还可以回来继续用那个座。联大的同学也在那里游戏呀，打桥牌啊，排戏啊，唱歌等。当时的生活虽然不好，但大家那个学习精神确实是很可贵的，大家都兢兢业业，考试也很严格正规。而且学生每学完一门课程都要写一种类似于心得的文章，就是当你学习到了一定的阶段，必须要写出自己学习后的新发现或者自己的新领悟交给老师。这就要求学生不仅仅只把老师教给你的教科书的内容学好，而且还必须有创造，培养一种创造性的思维，

这就要求自己看参考书，阅读另外的一些资料。

另外就是常常要求学生参加学校的各种学术活动，联大的每一个学科都会举办学术讲座，事先要把讲座的通告张贴出来。讲座是成系列的，比如说经济学二十讲，《红楼梦》多少多少讲，什么样的讲座都有。都是教授们把自己研究的东西拿出来进行学术讨论。这些学术讨论是比较自由的，几乎是每星期都有几次学术报告，一门学科总会有十几讲或者二十几讲，是把那一门学科的最新的一些进展，实际上属于前缘科学的范畴，把这些都拿来教给我们。当然，教授们都会有自己的发现或者自己的观点，允许彼此之间不一样的观点存在，各人讲各人的。我记得有一次有两个教授，一个男教授，一个女教授，分别在两个教室做学术讲座，一个教授讲的内容被另一个教授听到了，觉得讲得不对，就跑过来直接指出这位教授所讲的不对，这位教授则很大度地让跑过来的教授讲出自己的观点。最后两位教授还当场发生争论，争论得非常厉害，学生们看他们争论，也觉得很有意思。学生们也可以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并且也可以上台去讲解自己的观点，教授也很大度地让其讲。虽然有时候看上去很紧张，大家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候几乎是水火不容，但毕竟是一种学术上的争论。讲完后，两人下讲坛还握握手，然后有说有笑地回去了。当时那样一种学术风气是很有意思的啦。

我们西南联大后来出了那么多优秀的学者，应该与当时好的风气很有关系，要求老师和学生都得有自己的学术思想，要求有创造性。

## □ 口述历史

那时学生人数也比较少。比如说中文系，当时我在那里的时候整个系只有六十几个人，而我们那个年级也只有十几个人，我的那个学科一个班上只有四个人，我虽然在中文系，但我的专业是语言文字学，学的是甲骨文、声韵学、语音学等。教师有罗常培、陈梦家等。就是说，一个年级里学这个专业的只有四个人。有时候学生就到老师家里去，老师泡上一壶茶后就开始授课，变成了一种私塾教学的形式，将来变成他的学生后，属于他的宗派了。我虽然读的是语言文字专业，但我又喜欢文学，所以，文学方面的一些主要的课程我都选了，像朱自清的、李广田的、卞之琳的等，我都选了一些。

闻一多先生的课程我选得多一点，因为我与闻一多的关系比较熟一点。其他那些教授的课我选了不少，但平常并没有多少往来，唯独与闻一多的往来比较多。因为我在鄂西做特委书记的时候他的几个侄儿都在我的手下做党的工作，所以到了西南联大，我与闻老师同路回家的时候就谈起来，我就说：“当我在鄂西的时候，你的几个侄儿都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一听就知道我大概是什么样的身份了，他说他们都到那边去了，就是到延安去了。由于这个原因，他多少就和我亲近一点，我送他回家的机会也多一点。当时闻先生住在昆华的一个小楼上面，离上课地点有二里地，每天当他上完课后我就送他回家。他的生活确实清苦，他一家子人口多，工资不够用，他就在业余搞雕刻，通过刻印章来增加一点收入。虽然生活清苦，但个人的精神状态则是非常好的，常常谈笑风生，他讲课好像比其他著名教授的课的吸

引力都要大。虽然由于名额的限制，报他课的人数不允许太多，但实际听他课的学生却很多，每次课教室里都坐满了，连窗台上坐的都是人，站在窗台外面听的也有很多人，他的课几乎每次都是这种状况。他讲课非常生动，总是引经据典，加以发挥，像讲故事一样。他又有诗人的气质，兴趣盎然时他还吟诵起诗来，所以他讲的课比如楚辞也好、唐诗也好，比较受学生欢迎。他指导学生的新诗创作，是青年学生的导师，因此他经常和那些喜爱新诗的学生在一块，参加学生的诗朗诵等活动。闻一多先生不仅仅具有深厚渊博的学识和扎实的学术基础，而且我觉得相较于其他教授，他在思想上的进步也更快一些。当然，与我的往来多了，他也能从我的口中得到有关我们党活动的情况和政治主张的情况，所以后来他参加了民盟，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的一位负责人。这时与我的关系就更多了，因为我是我们党支部的负责人，在学生运动中与他们民主同盟经常要有接触。

闻一多先生是很诚恳、很真实的人，特别值得尊敬。他敢于剖析自己，比如说一次要举办鲁迅纪念会，我们感觉应该请他参加，但如果请他，又感觉有一些不便之处，因为他是属于新月派的，过去曾经与鲁迅先生有些过节。后来我就去请他，他居然去了，他不仅去了，而且还邀约其他的教授一起去了。他还上去发表了讲话，还面对墙上的鲁迅遗像鞠了一躬，回过头来还说：“鲁迅对，我们错了。”他公开改变他自己对鲁迅的态度，这在其他教授是不可能的。闻一多是一个特别有性格的诗人，也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由于我与

他的往来比较多，我后来写的追述他生平事迹的材料也比较多。其他的教授我只是选他们的课，如朱自清的散文，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等，但和他们并没有深入的接触。

## 文学创作要“烂熟于胸，偶然得之”

关于我的经历，特别是我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的问题。一般说起来，我幼时发蒙以后，读私塾了，读的都是中国的古书，包括中国古代诗词之类的，还有就是练习书法。经过这种种训练，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学很有兴趣。后来社会上倡导工业救国，我就去学工业了，考到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去学工，但我本身对文学依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还是我在上海读中学的时候，当时正好遇到叶圣陶办的《中学生》杂志，它正在向社会征文，我的国文老师就建议我写一篇稿子。因为当时在班上，我的那个国文老师就注意到我的作文写得比较好，就叫我去投稿，我就参加了。结果我得了奖。我只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居然在杂志上发表了，这就算是我的第一篇创作。后来我到了武汉，又在我们的党报《新华日报》上发表过报告文学，还在武汉的一个杂志《战时青年》上写过一篇文章。这样，我始终不断地对文学方面表示关注，喜欢研读这方面的东西。

到了昆明后，我学的专业是语言文字。说老实话，当时我的年龄确实比较大了，已经27岁了，人家一看就发生疑问：这样一个小老头来读什么来了啊？我就有意识地转学中文系的语言文字专业，当人家一看我在学甲骨文、语音学、语言学之类的东西，也就是很古板的東西，人家也对我

本人不感兴趣了。这就有利于我隐蔽自己的真实面目，实际上我还是在做自己的革命工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对文学还是很有兴趣，所以文学的课也选得多，但各种革命活动也参加。我到西南联大后完成的头一篇作文得的成绩是A<sup>+</sup>，所以我对写一些文学作品有兴趣。在西南联大时我就开始写一些东西，和一些文学方面的爱好者有一些往来。我在联大的时候写过一个长篇，写过几个短篇。当时张光年也是隐蔽在昆明教书，我们本来就认识，我们就合作起来办了一个文学刊物叫《新路》，但这个刊物后来被查封了。我也写小说。后来我还自己主办了一个刊物叫《大陆周刊》，我是主编，刊物上发表了大量针砭时弊的杂文。当时一方面我搞语言文字专业，一方面文学创作我也做。还写过一本短诗集，两本长诗集，一个长篇，办了一个刊物。这就是我当时的一些文学活动。我办的《大陆周刊》是带杂文性质的东西，那时候就找闻一多、吴晗等人给我写稿子，写稿子的还有吕剑等。

《夜谭十记》我在联大时就开始写了。因为我读了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后对幽默与讽刺一直都比较喜欢，我就试写一篇文章，内容取自我做地下工作时所看到的一些人和事，这篇文章名字叫《视察委员来了》。这就是我所写的《夜谭十记》中的第一篇文章《破城记》开头那一段。其他方面的内容也写过一些，《夜谭十记》里也用了一些。因为我过去做地下党工作需要到处走动，而且要以各种各样的身份出现，就可以收集到各种素材，特别是在一个县政府里当科员时，晚上和一些科员在那里喝茶，他们会摆龙门阵讲故事，我

## □ 口述历史

就非常注意，就记下来了。在联大时期也记述过这方面的内容，但还没有成形，真正成形的只写成一篇《视察委员来了》。所有这些稿子，在我调动工作后就烧掉了，因为我们党的纪律规定，在转换了位置以后，在原来地方工作时所形成的所有有关资料，包括相片、通讯信息、信件等，全部都要烧掉，因此我当年的照片都没办法再找到。

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但我与别人还有不同之处，因为我不是一个一般的党员，我可以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就是当我入党之后组织上就看中了我这个人，要我当职业革命家，而且预先就给我说清楚了，当职业革命家就是要专门做党的地下工作，不与外界有交往。从事这项工作是非常危险的，大多数同志都牺牲了。当时组织上就问我，当职业革命家要随时准备牺牲，问我干不干，我说我干！所以我后来就一直做党的秘密工作。所以，当时把这些宝贵资料全烧掉也不觉得可惜，认为是应该的。但事后又总是念念不忘，因为作品中的那些人物一直在我的脑子里，不容易褪去，都是在我做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所碰到的许多的人，在革命斗争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这些东西，已经沉淀到了我的脑子里。所以，有时就想写，尽管以前写的都丢了，还是想把它写出来，而且其中的人物，有很多都是在做革命工作的过程中牺牲了。即使在我做梦的时候，这些人物也会回到我的梦中，与我交谈，要求我允许他来担任我小说中的某一个角色，在梦里头就有这样一种情况。

“文革”中我之所以挨打，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当时对我搞“喷气式”来批判

我，我低着头嘛，这时我忽然会想起我小说里头的人物，他们就跑到我的面前来了，我就与他们交谈起来了，我就笑起来了，结果造反派就把我的脑壳猛打一下，把我给打醒了。他们呵斥道：“现在批判你，你还在笑！”其实我当时根本就没有听到他们批判我什么，我还在与书中的人物交谈着。所以，这些人物在我的脑子里真的是非常熟悉。

我觉得要想搞好创作应做到“烂熟于胸，偶然得之”，就是要使在生活中积累的素材非常熟悉，偶然一个触动就把它写出来了。我的作品大概都是这样一种东西。

与现在文学创作的不一样之处在于我所创作的基本上都是革命文学。所以，我常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自认为我只是一个职业革命家，我的作品也只属于革命文学的范畴，和真正的文学，至少与我的老师教过我的有关文学创作的手法与要求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就是说我不会使用文学大师的手法去完成一部高水平的文学作品，而仅仅只是写出一些回忆性质的、革命宣传性质的、具有教育意义的作品。我写的这方面的作品比较多一些，所以我一直说我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的作家，我写不出传世之作，我写出的东西都是革命文学，发挥了对革命的推动与对群众进行教育的作用，这个我是做到了，但我没有能力完成能在文学上作出比较高水平贡献的传世之作，也不大可能做到这一点了。虽然有些作品当时的确还流行过一阵，比如说《清江壮歌》，当时一开印出了20万册，后来也印出了几十万册；《夜谭十记》一开印也是20万，后来被姜文的电影《让子弹飞》吹了一家伙，到现在也不知印了多

少了，有好几个出版社都印过了，但那仍然不是我所期望的比较好的作品。

可以说现在我的脑子里有很多的素材，而且我认为这些素材能够真正反映出 20 世纪中国真实的面貌，但我已经写不出来了，没办法再写了。我所有的这点文学创作的本事，确实是在联大经过科班训练得来的，可以说我应该够资格充当一位作家，但没有达到老师教给我们的一位优秀作家应该达到的水平，我的确没能做到。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我所看到的解放后有关讨论文学创作的文章，很多都是在讨论作品的思想性之类的东西，好像并不考虑作品应该选择怎样的艺术手法。而在西南联大，老师则告诉你创作作品时必须要知道一些什么东西，讲的尽是这些东西。比如说一个短篇，怎么开头，他就告诉你怎么开头，当中怎么样组织矛盾，发展矛盾，如何选址，如何推向高潮，如何扫尾，如何把尾部发展好。要注意你是第一作者，读者是第二作者，你不能把本来应该让第二作者做的东西给做了，如果这样，你这个作品就不行了。如此这般的道理讲得很多，而且也很具体。比如说讲开头，我记得是把托尔斯泰的还是谁写的一本书的作品，试着进行改写，就改写开头。写了十几个开头，都不算数。他们把这十几个开头都摆出来，供大家研究，是什么道理这十几个开头都不行，而只有这一个开头行。同时还教给我们如何写作，给我们每位学生一个题目，各人的题目是不同的，要求我们自己进行创作，就是采用这样的做法来训练我们的。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在进行科班训练。我认为要成为一个作家，必须要经过这样的科班训练，只有

接受过这样的训练，才能真正写出好东西来。当然，能否写出好作品还依赖于生活的积累。老师讲，生活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我们教你的是怎么样写，怎么样写得更好，是教你这些东西。还是那句话，引你们进门，后面的则是各人自己的事情。这是老师们自己的说法，所以我的文学创作水平只能算是半吊子。

我这不是谦虚，人家给我发什么终身成就奖（2012 年 8 月，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授予他“东方文豪终身成就奖”），其实我几次都讲过了，在文学艺术创作上我没有终身成就，我只有终身遗憾。我所遗憾的就在于我在 20 世纪有着长达八九十年的生活经历，我所看到的在脑子里记忆的素材，确确实实可以支持我写出一部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一部传世之作来，但实际上我已无法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我做不到，没能做到，也不可能做到了。《夜谭十记》80 年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作家韦君宜就跟我：“你这个《夜谭十记》有很多特点，你可以把那么多的故事组织成一个‘夜谭系列’，就是摆龙门阵这样一种形式。”我们已经商量好了，马上去搞一个《夜谭续记》。十个故事也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后来她病了，我有工作忙，就没有写。现在故事还在我脑子里了，还没有拿出来。

现在看来，我们作家的问题是生活问题，当然也有严格训练的问题。西南联大那种严格训练还是有作用的。同时要有生活，缺乏生活怎么搞也不行。现在不是没有生活，是大家没有好好生活，大家都在为钱奔忙。

（2014 年 6 月采访整理）